

# 近四十年來《國語》文學研究述評

郭萬青<sup>\* \*\*</sup>

## 摘要

基於學科背景下的《國語》研究是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基於中國文學背景的《國語》研究實際上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纔真正開始，至今跨越四十年的光陰。近四十年來的《國語》文學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國語》文學價值或《國語》文學成就研究、《國語》敘事方式與敘事特點研究、《國語》記言方式及特點、《國語》寫人方式及特點、《國語》藝術性或語言特色、《國語》具體篇章研究、「春秋筆法」與《國語》、《國語》文體與文類等八個方面。總體而言，研究成果相對豐富，但仍有進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空間。如在《國語》與他書敘事、記人比較，《國語》文學語言，《國語》文章學等方面，都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關鍵詞：**《國語》、文學、敘事、語言、篇章

---

109.9.16 收稿，109.12.14 通過刊登。

\* 郭萬青（1975—），男，漢族，山東寧津人，唐山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先秦文獻與訓詁研究。聯繫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建設北路 156 號唐山師範學院文學院（063000），手機：13513045092；email:okwanqing@sina.com。

\*\* 本文係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國語》研究史」（編號：15YJA770004）和 2019 年度國家社會科學重大招標項目「《國語》文獻集成與研究」（項目標號：19ZDA251）階段成果之一。感謝《高雄師大國文學報》審查委員會提出的修改建議！

# **A Summary of *Guo Yu*'s literary study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Guo, Wan-qing<sup>\*</sup>**

##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s began to study *Guo Yu*'s literary since 1980s. Up to now, i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40 year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Guo Yu* can be divided into eight aspects, which includes literary value or achievement,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recording characteristics,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language art, specific items, research, article genre, etc. Overall,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relatively rich.

**Keywords: *Guo Yu*,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language, chapter**

---

<sup>\*</sup> Department of Chinese,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 一、前言

《國語》作為一部先秦散文作品，其文學價值得到學者的較多關注應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事情。此前的關注一方面見於宋以來學者的零星評點，如前人已經提到柳宗元一方面批評《國語》一方面又從借鑒了《國語》的敘事方式或文學特徵等等，另外一方面見於近代以來的文學史著作，如各種文學史中僅有的幾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對《國語》文學價值的揭示。絕大多數文學史著作，更多產生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國語》文學研究相對而言比較繁榮。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包括《國語》文學價值、《國語》敘事方式及特點、《國語》記言方式及特點、《國語》寫人方式及特點、《國語》藝術性或語言特色等諸多方面研究。

## 二、近四十年來《國語》文學價值與成就研究

明清時期，由於評點學的發達，學者對《國語》之文學價值多有揭示。近代中國學術路徑以及方法發生很大的轉變，《國語》作為史書及其較少進入文學研究者的視野，故對《國語》文學價值之研究亦希。近四十年來，由於文學研究也向細密化發展，傅庚生〈國語選序〉較早對《國語》文學價值進行揭示，謂《國語》「繼承著歷史散文的傳統，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對《國語》的文學價值和文學特色進行了揭示。劉心予對《國語》人物刻畫等有所揭示。

真正第一篇鮮明提出《國語》文學價值這一命題的為譚家健。他在〈試論《國語》的文學價值〉（《江淮論壇》第6期，1983年）中首先指出《國語》是優秀的史傳散文，進而總結《國語》的文學價值主要表現在人物描寫、故事情節和語言藝術三個方面。人物描寫體現在：

（1）有將某個人言行集中一起、向人物傳記過渡的趨勢；（2）在矛盾衝突中展示人物性格及其發展，通過對比體現作者愛憎；（3）通過

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態度，顯示一群人的不同思想、個性和社會地位；

(4) 圍繞中心人物，刻畫一些次要人物作為陪襯使之相得益彰。故事情節體現為：(1) 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想象和虛構；(2) 運用幽默、諷刺，記述一些戲劇性的情節故事，達到批評和勸諫的目的；(3) 用誇張渲染的手法，著意描寫重大場面和製造某種氣氛。語言藝術體現在：(1) 通俗化、口語化；(2) 風格多樣化；(3) 議論條理化。

林永堅《《國語》之文學價值析論》概括《國語》文學價值為四點：(1) 是論諫文章的典範，已經脫盡《周禮》《尚書》語調，實為今文始祖。(2) 為古代各諺之華實，所徵錄歌諺之類屬，體現出《國語》作為宗廟文學而兼有俗文學之特色。(3) 為神話志怪之濫觴，《國語》所徵引傳說、靈異之類屬，實為神話之記載與志怪小說之發源地。

(4) 為戲劇對白雛型，《國語》雖無意以為戲劇，而其「對話」之體裁，實為現代戲劇對白之雛型，故而特具戲劇效果。<sup>1</sup>和譚家健之說不同，林永堅是從引領作用和源頭角度對《國語》文學價值進行概括的，所見更為宏觀。按照林氏的看法，則《國語》實際上是後世散文文學之祖。正可與譚家健之說互相補充。

黃永堂認為《國語》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具體體現在：(1) 就事說理，精彩的記言，對後世的議論文，尤其是戰國諸子的議論文有直接影響；(2) 長於歷史人物的諫言和對話，語言簡潔古樸，而議論時的旁徵博引、對話中的巧譬善喻，又能使文章理由充分、曲折盡情，具有較強說服力；(3) 《國語》記言還表現在記行人辭令之美；(4) 作為歷史散文的《國語》，主要還是通過言論的記述，來記載那個時代重要政治人物的活動；(5) 《國語》雖然敘事少，但篇章完整，不少故事情節生動，有頭有尾，對人物性格有較細緻刻

---

<sup>1</sup> 林永堅：《《國語》之文學價值析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

畫，可以單獨成爲一個文學短篇；(6)《國語》偶爾也有大場面描寫。故而認爲「《國語》不少篇章，已經初步具有後世傳記文學和歷史小說的基本特色，表現出歷史散文在文學上進展的痕跡」。<sup>2</sup>黃氏的概括和譚家健的說法有重合之處，比如謂《國語》具有故事情節性等；和林永堅說也有重合性，如謂《國語》對後世議論文的影响等。總體而言，也對《國語》的散文特點與藝術特徵有所揭示。

熊憲光認爲《國語》「文章各具特點，風格頗不一律」，並嘗試探討其規律、具體表現以及產生原因。熊文先通過《國語》、《左傳》「曹劌論戰」的記載比較入手，謂：「《左傳》之文不僅記戰前之問，而且記了戰時之情和戰後之論。《國語》之文則僅記戰前之問，且顯得冗長、蕪雜，遠不及《左傳》所記之精鍊、扼要、傳神。」進而以「曹劌論戰」爲參照，和〈吳語〉「包胥問戰」做了比較，謂二者：(1) 主旨有別；(2) 繁簡不同；(3) 文風異趣。進而指出「《國語》全書雖由 243 則故實組成，但各則長短不等，並且大多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倘若分離出來，未嘗不是形完神備之作」，並且認爲《國語》存在南北史家文風的不同，認爲「南北史家之文無論在思想傾向、內容剪裁、語言、結構諸方面都有所差異」。揭出史家之筆也有南北之分，具體體現在：(1) 思想傾向及記述意圖有所不同。謂《國語》中的「重民」、「尚禮」、「崇德」等方面的思想傾向主要體現在周、魯、齊、晉、鄭等北方史家的記述中。而〈吳語〉、〈越語〉則表現出鮮明的「重天命」、「重智謀」的思想傾向。(2) 文體與記述重點有所區別。謂《國語》八語，文分二體，或雜記一國先後事，或專記一國中之一件事。「周、魯、晉、楚，屬於前者；齊、鄭、吳、越，則屬後者。前者之中，楚爲南國，其文體類同周、魯等語，可見史家深受北方文化浸潤。後者之中，齊、鄭爲北國。〈齊語〉專記齊桓霸業始末，〈鄭語〉專記鄭桓

<sup>2</sup> 黃永堂：〈簡析《國語》散文創作的獨特成就〉，《貴州社會科學》1996 年第 4 期，頁 81—84。

公與史伯問答，情況較為特殊」，「雜記諸事之周、魯等語，文無側重之點，事無關聯之線，純為史料之綴輯。專記一事之〈吳語〉、〈越語〉，則以某一主要人物為中心，記其言，敘其事」。(3) 語言風格大不相同。熊文認為〈周語〉、〈魯語〉、〈晉語〉為代表的北方史家之文的語言風格主要表現為深厚渾樸、平實典雅，〈楚語〉、〈吳語〉、〈越語〉表現為奇峻恣放、文采斐然。具體體現在：(1) 講究修辭，氣勢充沛；(2) 善於描敘，生動感人。熊文通過《國語》南北不同的風格得出兩點啟示：(1)《國語》實際上主要來源於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述，並非出於一人之手，也非成於一時一地，故其作者不可確指。《國語》是各國史料彙編而成，它經過後人的排比潤色，但大體上仍保存了史料的本來面目，在戰國初年或稍後編輯成書，因源出各國、人文地理各異、歷史文化背景不一，故史筆風格不同。(2)《左傳》是一部記事詳贍完整的編年體史書，《國語》則是以記言為主、分別記載周王朝及諸侯各國史事的國別體史料彙編。二書顯然各為一家，所謂內外傳之稱，分明不妥。既細緻指出了《國語》的風格特點，又對《國語》的諸多問題給予了一定程度的探討。<sup>3</sup>

黃麗麗認為《國語》中有不少佳篇，應占文學史一席之地。<sup>4</sup>張居三認為：「從文學的角度審視《國語》的價值，除了傳統的關於體例、塑造人物和語言運用特色的認識外，《國語》有明確的編撰原則，且能在具體選擇史料和安排結構上貫徹這一原則，體現了私人撰述的自覺意識，這種編撰的自覺意識反過來又提供編撰者足夠的創作空間。」故張居三認為《國語》有意識刻畫人物，增強了文學色彩，同時也孕育了中國傳記文學的最初萌芽，「從文學角度看，《國語》是先秦歷史散文集，如同文選彙編，因形式上各個獨立，互不相屬，故而在語言

<sup>3</sup> 熊憲光：〈國語風格南北異趣〉，《史學史研究》第3期（1994年），頁25—32。

<sup>4</sup> 黃麗麗：〈《國語》的性質與價值——由出土文獻引起的思考〉，《江蘇大學學報》第1期（2006年），頁43—47。

運用和敘述方式上，沒有做整體分析研究的必要。每一篇散文都有自己的表現手法和藝術特色，卻同樣表現其審美價值。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看到在看似簡單的史料拼湊的背後，其實有著編撰者良苦的用心，這一份光芒不應該被其語言和敘事的缺憾所掩蓋。」<sup>5</sup>張居三從編纂意圖的角度對《國語》文學價值進行發掘，言人所未言。

陳桐生從歷時角度著手，認為《國語》反映了《尚書》之後、《左傳》之前西周春秋歷史散文的發展水平。和《尚書》相比，《國語》文風呈現出四個走向：「一是語言從渾厚古樸走向流利暢達；二是內容從記載嘉言懿行轉向權術智謀；三是由記言走向記言敘事並重；四是表現手法由單一趨向多元。」《國語》記言抽象能力有所提高，說理方式演化為主題突出、結構緊湊、條理清楚，確立了賓主對答的形式格局。<sup>6</sup>在其譯注的《國語》前言中，對《國語》的文學價值進一步做了揭示，可參前文。

張鶴結合前此學者研究，從語言運用、謀篇佈局、人物形象、情節結構四個方面對《國語》文學成就進行了梳理。<sup>7</sup>裴登峰《〈國語〉研究》對《國語》文學價值也有總結，謂《國語》敘事用「互見法」，《國語》敘事採取網狀結構，《國語》塑造了人物群像，《國語》有多樣的場面描寫，最終認為：「《國語》不僅性質上很有特點，而且在藝術上，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表明了我國『語』類文獻的文學化演進過程，為我國古典小說從體制、語言、人物塑造、情節與場面描寫，做了很多方面的藝術準備，在說理文中也形成了鮮明的特色。」<sup>8</sup>史繼東認為，如果把《國語》放在中國散文發展史的宏觀視野中加以考察的話，就會發現「《國語》不再只是《左傳》的附屬品，而是中國散

---

<sup>5</sup> 張居三：〈《國語》的編撰意圖及其文學價值〉，《求是學刊》第3期（2007年），頁107—111。

<sup>6</sup> 陳桐生：〈《國語》的性質和文學價值〉，《文學遺產》第4期（2007年），頁4—13。

<sup>7</sup> 張鶴：《〈國語〉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頁153—191。

<sup>8</sup> 裴登峰：《〈國語〉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255。

文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從而具有獨立的文學價值」，具體體現在：(1)《國語》是研究春秋時期，我國不同區域散文發展狀況的活化石和活標本，具有其他先秦文獻所不能取代的獨特地位；(2)《國語》上承《尚書》《春秋》，下啟《左傳》《國策》，其文學史地位不容取代。並且它是代表我國西周、春秋時期散文水平的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3)《國語》是一部議論總集，是作為一種教材使用的。<sup>9</sup>

夏德靠認為《國語》不但存在南北文風的區別，同時北方史家之文本身也存在差異。此外，地域政治文化的差異，造成了《國語》各國文章風貌的差異，但各國內部文風卻呈現出相對的穩定性。<sup>10</sup>

有專門從歷史文學角度進行概括者，如毛麗認為時代早於《左傳》的《國語》首開古代史學的歷史文學之風，具體體現在：(1)好預言；(2)宣揚重德重民思想；(3)《國語》在歷史文學上開了古代史學之先河。在論預言、論人物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並為《左傳》所繼承。<sup>11</sup>

也有對《國語》部分內容文學價值或文學成就進行論說者，如李書安《〈國語·晉語〉文學成就研究》(寧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徐君輝《〈國語·晉語〉文學文本研究》(貴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李書安與王紅麗合撰〈從「文」字看《國語·晉語》中的文學意識〉(《電影評介》第21期，2009年)、李書安〈《國語·晉語》的傳記藝術及其文學價值〉(《求索》第5期，2010年)等。

李書安對〈晉語〉藝術成就的概括主要通過敘事、人物描寫和語言藝術三個方面進行概括。李氏認為〈晉語〉敘事：(1)故事情節完整，敘事脈絡清晰；(2)文章結構穩當，敘事手法多樣；(3)基於歷

---

<sup>9</sup> 史繼東：《〈國語〉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3-9。

<sup>10</sup> 夏德靠：《〈國語〉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頁148-149。

<sup>11</sup> 毛麗：〈試論《國語》的歷史文學成就〉，《漳州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3年)，頁34-35。

史，虛構想象。〈晉語〉人物描寫：(1) 集中篇章專寫某一人物言行，呈現出向人物傳記過渡的趨勢；(2) 善於選擇材料，突出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3) 在矛盾衝突中展示人物性格，通過對比體現作者愛憎；(4) 運用細節描寫，使人物性格鮮明，具有立體感，呼之欲出；(5) 圍繞某一事件或某一中心人物，刻畫人物群像。《國語》語言藝術體現在：(1) 含蓄端莊，簡練流暢；(2) 準確生動，善於概括而又富於變化；(3) 嚴謹的議論，優美的辭令；(4) 句式靈活多變，但不乏工整的句子；多種修辭運用，增強文字表現力；(5) 機智幽默的語言；(6) 詩文、民謠的廣泛運用。可見，李氏對《國語》文學藝術成就的總結，實際上也是對《國語》文學藝術成就的總結，而且是對前人總結一次匯總和梳理。李書安通過〈晉語〉文學對後世的影響去看待其文學價值的。徐君輝主要通過〈晉語〉的記言、敘事特色的梳理與研討，認為〈晉語〉的文學成就體現在：(1) 〈晉語〉把人物的表現放在了最明顯位置，並且在實際上對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世界做出了它的努力，取得了它的成就；(2) 〈晉語〉對人物的表現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和技巧，並且這一方式和技巧為後人所承繼，形成鮮明的民族性。其中最突出的是，通過人物自己的外在言行或與人物自身相關的小故事來表現人物內心理智的或情感的世界；(3) 〈晉語〉不是為了表現人物而表現人物，而是有它的社會意義和政治目的。這一點在後世得到長時間的響應；(4) 〈晉語〉記言、敘事、寫人相互結合的寫作體例也同樣為後世長久地繼承。<sup>12</sup>

還有從《國語》記言之「言」的角度對《國語》文學意義進行探討者，如李書安《《國語·晉語》文學成就研究》就有對〈晉語〉對問的分析，而姚琳琳《《國語》對話的文學與思想意義》(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則是對《國語》對話類進行的專門研究，

---

<sup>12</sup> 徐君輝：《《國語·晉語》文學文本研究》(貴州：貴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並從表現形式、文學風格、藝術手法等方面對《國語》的影響進行了梳理與總結。

### 三、近四十年來《國語》記言、《國語》語言研究

《國語》是「語」類著作，自然以對話為主體，而記言自然就是《國語》的主要內容，故對《國語》記言方式、說理方式以及特點、功能的研究，就成為《國語》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也有針對《國語》全書之語言進行研究者，記言、語言二者內容雖然有別，但又互有交叉，且概括特徵又有相同之處，故放在一起進行梳理。

首先從事《國語》記言研究的是王增文和萬平。王增文認為《國語》是歷史散文彙編，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其寫作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略于記事，長於記言」。王氏認為《國語》記言有幾個特點：(1) 所載勸諫、辯詰、應對之辭，邏輯性強，具有較強說服力；(2) 人物語言切合人物性格、身份和處境，顯得真實可信；(3) 人物語言生動形象，具有較強表現力。又具體體現在對話幽默和人物語言中大量運用了比喻、誇張、反語、排比等修辭手法兩個方面；(4) 所載人物語言能夠恰當運用語詞虛字去表示人物的情感和語氣，非常口語化。<sup>13</sup>王氏主要從《國語》的記言特點切入，對《國語》文學特點進行概括。第一點主要是記言的內容或形態，第二點至第四點是言語手法。

1985年，萬平在華中師大《研究生學報》第1期發表〈《國語》記言芻論〉。該文首先為《國語》定性，謂：「《國語》是一部以記人為中心的側重於記載嘉言善語的言論匯集。」進而梳理了歷來對《國語》語言藝術的評價，並從五個方面對《國語》記言藝術進行概括，分別為：(1)《國語》諫說之辭邏輯性十分嚴密，層次清晰，有條不

---

<sup>13</sup> 王增文：〈試談《國語》記言的特點〉，《商丘師專學報》第1期（1985年），頁57-61。

紊。道理明審，論據充實，具有強烈的說服力。並且指出《國語》大部分諫言都沒有被國君採納。(2) 人物對話生動活潑、風趣形象，富於戲劇色彩。明白曉暢的對話接近口語，結合人物身份、處境、性格，表現得傳神逼真。(3) 《國語》不乏氣勢磅礴的排比句式，層層遞進的議論，形成獨特的敷張揚厲的風格。(4) 生動、貼切、形象的比喻，使《國語》論說之辭增色生華，既加強了說明力，又能使文章搖曳多姿，富於變化。(5) 《國語》記言慣於博引史實，引古證今，以古例今。最後總結謂《國語》記言「講理性，多史實，崇禮儀，隆制度，重人事，尊天道」，謂其語言風格「古樸、質直」，「又有一些想象虛構的色彩」。前兩點是從記言的內容上講，後三點是從言語的手法上講。概括相對較為細緻。其說可和王增文之說相參。

林徐典〈《國語》的人物、結構與語言〉只是一個方面，並非專門研究，但也指出《國語》語言藝術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即人對對話的口語化傾向，另外揭出《國語》中議論說理的文字有的顯得很整飭，並指出《國語》人物對話中有許多對偶、排比的句子，謂「偶句和排句的大量出現，說明《國語》作者在記錄歷史人物的議論、對話或互相駁難時，是經過一番修飾功夫的」。此外也指出《國語》的語言還具有辯鋒尖銳、說詞委婉、用字生動、設譬恰切等特點，並且認為《國語》的歌謠諺語「不但有整飭的句式，而且有深刻的內容，其中還有許多淺近、簡明、恰切和確切的比喻」，對記言文字的說教目的以及各語語言風格的不同也進行了揭示。<sup>14</sup>可見，該文雖然不專門進行《國語》語言研究，但其提出的很多方面，都是後來《國語》記言或語言研究的基本內容。

可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比較稀少。一直到本世紀，纔

<sup>14</sup> (新) 林徐典：〈《國語》的人物、結構與語言〉，林徐典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集刊》(三集)，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1990年8月出版發行，頁1-46。

又有學者對《國語》語言或《國語》記言進行研究，角度、內容各有不同。

有從體裁角度進行研究的，如王寒冬〈《國語》「記言體」辨〉（《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2期，2008年）歷數了前此關於《國語》記言以及語類性質的論述，進而指出《韓非子》稱《國語》為「記」、《大學》稱《國語》為「楚書」，至司馬遷纔出「國語」之名，後世遂沿用至今。接著引述白壽彝「《國語》與《尚書》之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對所描述的每一件事幾乎都有非常清楚的前因後果的交待」，引申為《國語》雖然記載人物話語，但《國語》注重「事件交待的完整性」。進而以〈晉語〉為例，說明《國語》的人物言論實際上是敘述歷史事實的方式。又進一步指出記言體的《尚書》所記皆為文件類，但《國語》幾乎沒有文件類的材料，人物言論中包括：（1）言論所屬階層多樣化；（2）言論敘事歷史事件相當廣泛；（3）言論中勾勒出歷史政治形勢的變化趨勢。王寒冬最終認為《國語》的記言就是記事，或者說是用一種特殊方式記事，即言、事合敘方式，也即「通過搜集各國的記言、記事類史籍和相關記錄，對大量重要歷史事件參配以各類相關任務的有歷史借鑒和社會教育功能的談話和評論，運用言事結合、分國羅列、各國按時間先後排序的形式來表現，使人能夠從言論中得知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在王寒冬看來，《尚書》的記言，言既是內容也是形式，二者是完全吻合的，因為《尚書》實際上是公文彙編，自然從形式到內容都是言。而《國語》中的「言」只是記錄形式或手段，言中所體現的是人和事。這種說法，比較符合《國語》實際。

有對部分言語形態進行研究的，有的學者專門研究《國語》諫辭，如陳鵬程〈試論《國語》的諫辭藝術〉（《焦作大學學報》第4期，2009年）。該文從嚴密的邏輯性、高度的形象性和巧妙高超的諫辭技巧對

《國語》諫辭藝術進行了概括。具體而言，邏輯性體現在：(1) 臣子把對事理的剖析建立在時人共同確信的邏輯起點上；(2) 還表現在結構的嚴整性、論點和論據之間的有機聯繫上。形象具體表現為：(1) 排比手法的運用；(2) 層遞手法的運用；(3) 比喻手法的運用；(4) 反問手法的運用；(5) 頂真的運用。諫說技巧具體表現在：(1) 巧妙設疑，把握主動；(2) 通過仿效對方的錯誤行為，寓諷諫於其中，使對方反省到自己的過失；(3) 欲抑先揚，巧用反語。認為諫說之辭「體現了西周、春秋時人的最高論證水平，推動了語言經驗技巧的發展，對後世的文學尤其是論說文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有的學者專門針對《國語》中的外交辭令進行研究，如陳鵬程〈試論《國語》的外交辭令〉(《新餘高專學報》第3期，2008年)、杜鵑〈論《國語》外交辭令的語言藝術〉(《甘肅社會科學》第2期，2010年)，陳鵬程對《國語》外交辭令的內涵和語言藝術進行了總結，謂《國語》外交辭令具有崇文尚禮的文化內涵，具體體現在：(1) 稱引先王禮制或先王之命；(2) 委婉謙恭、言辭從容、莊重典雅、精煉深刻、張弛有度的風格。其語言藝術表現為邏輯性和形象性的有機統一，具體而言，包括：(1) 說理嚴密，富於文采；(2) 豐富多彩的修辭手法，包括引用手法、對比手法、反問手法、排比手法的運用。這種概括和其所梳理諫辭藝術基本一致。杜鵑把《國語》外交辭令的語言藝術概括為六個方面：(1) 引經據典，生動簡練；(2) 運用排比，氣勢恢宏；(3) 連用反問，咄咄逼人；(4) 擅用對比，突出利弊；(5) 巧用反語，正話反說；(6) 含蓄委婉，曲折達意。雖列舉較多，其實和陳氏總結差別不大。

也有的把《國語》的諫辭和外交辭令作為整體研究，如朱世業〈《國語》之諫言與行人辭命〉(《涪陵師院學報》第6期，2003年)。該文先從主客體異同、心態異同、技巧異同比較了諫言和辭命的不同，進

而指出諫言和外交辭令對文學研究的意義。

《國語》之言無非議論說理，故有從這一角度進行研究的，如唐愛明〈《國語》說理藝術擷英〉（《重慶三峽學院學報》第4期，2002年）、宋瑩瑩《《國語》議論藝術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等。唐愛明從嚴密的邏輯思維、準確的心理捕捉、簡潔警醒的語言三個方面對《國語》說理藝術進行了總結。宋瑩瑩對《國語》議論先分為說理文、政治論辯文、外教說辯文和應對說辭，又根據對象把說理文分為論國、論人、論事。宋文認為《國語》議論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春秋爭霸的不同階段，論說文的發展演變過程；（2）《國語》各語的地域特色在論說文的論述方式上的體現。體現出對《國語》各語不同議論風格的重視以及對《國語》議論風格的歷時演化，是對前此諸說的總結和細化。該文總結《國語》議論方法方式有分析論證、比喻論證、對比論證、推理論證、引用論證和舉例論證，把春秋爭霸不同階段的論述特點按照開始前、初始階段、鼎盛階段、尾聲階段四個節點進行梳理，從內容、語言風格、結構三個方面論述各國語論述風格。此外，王晗認為行人辭令和外教用語是《國語》語言特色產生的原因。<sup>15</sup>

有從《國語》言語所包含的內容角度進行研究的，如陳鵬程〈試論《國語》中歌謠諺語的政治功能〉（《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第4期，2008年）認為《國語》諺語的政治功能體現在臣下引諺以勸諫君主，在外交場合則悖作為公認的社會政治倫理準則來為自己的行為或主張張目，具有觀政和知人的作用了。而《國語》歌謠相對生動，表現為抒發譏刺與贊美情緒的議政功能、特定場合的遊說功能、童謠的政治預言功能等。

有對《國語》記言或語言進行整體論述的，如汪耀明〈《國語》

---

<sup>15</sup> 王晗：《論《國語》的語言》（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記言寫人) (《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 2006 年)、李書安與王紅麗合撰〈論《國語·晉語》的語言藝術〉(《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第 1 期, 2010 年)、師璐露《《國語》語言藝術研究》(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0 年)、周靜《《國語》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0 年)、王晗《論《國語》的語言》(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0 年)、史繼東《〈國語〉文學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1 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年版)、黨菲《《國語》語言和修辭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8 年)等。

汪耀明認為《國語》的文學特點體現在：(1)《國語》以記言為主，通過言論反映史實；(2)《國語》通過敘述史實刻畫人物個性。<sup>16</sup>所論較簡。李書安、王紅麗概括〈晉語〉語言藝術為：(1)含蓄端莊，簡練流暢；(2)準確生動，善於概括而又富於變化；(3)議論嚴謹，辭令優美；(4)句式靈活多變，妙用修辭，增強文章的表現力；(5)機智幽默的語言風格。師璐露首先把《國語》語言分為言、事合記的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師璐露借鑒王寒冬的看法，認為《國語》編者按照自己的思想旨趣和編纂意圖採用重點選錄的方式，通過敘事語言和人物語言的相互印證來表述歷史事件，此外，其語言表現形式豐富多樣、邏輯性強，說理透闢，大有寓幽默於警策之內的說教性質。進而對《國語》的語言風格，分地域國別進行了概括，對其成因進行了總結。周靜是從記言的體式、技藝和風格三個角度對《國語》記言特色進行概括的，認為《國語》以對話體為主、記敘體為輔，豐富了記言的形式，發展了記言技巧。王晗則概括《國語》的語言風格為平鋪簡潔、說理嚴謹、南北異趣、感情充沛。其中南北異趣一點，熊憲光早已言之。史繼東認為《國語》的說理章法立論正大而多樣、論據廣博而精要、結構謹嚴而有法，梳理《國語》說理方法為以理服人、以

<sup>16</sup> 汪耀明：〈《國語》記言寫人〉，《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2006 年），頁 49—50。

勢懼人、揣摩人心、先聲奪人、服之以巧。總結《國語》語言的整體風貌為平實暢達、駢散相兼、排中寓變，認為《國語》中的駢散相兼體現為對偶類型增多，工整程度提高，從內容上對《國語》所用排比句進行了分析，認為《國語》排比句的運用「不僅把複雜的內容表達得集中透徹，條理清晰，形式美觀，音節響亮，更使文章感情強烈，氣勢充沛」。此外，史繼東還結合《尚書》，對《國語》的虛詞進行了分析，認為：(1)《國語》虛詞的使用，使《國語》語言向通俗化、口語化邁進了一大步，同時也是古代散文由典誥語言向通俗的書面語言轉化的標誌之一；(2)《國語》取消了大量句首語氣詞，全書不用歎詞；(3)《國語》中轉接詞和句尾語氣詞大幅度增加。同時認為《國語》虛詞具有藝術功用，具體體現在：(1)《國語》擅用虛詞，不但使立言者的態度神態必先，而且使文字情韻悠長，耐人尋味；(2)《國語》有以虛詞為章法者，使其說理條理層次清晰。是從文學語言的角度對《國語》虛詞使用進行的探討，其說頗可玩味。黨菲則提出「《國語》的語言和言語觀」。黨菲借鑒史繼東的總結，謂《國語》語言平實暢達、駢散相兼、排中寓變，而其言語觀則表現為強調言語對個人生命價值的重要體現、強調言語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強調言語在外交中的作用、強調言語在人外在表現系統中的重要地位。

由上可見，對《國語》記言方面的研究和總結存在諸多方面，從內容、方式方法、風格特點到功能各個方面，研究比較細密，重複研究也比較常見。

#### 四、近四十年來《國語》人物文學形象研究

史傳著作研究中，人物研究是其必有之義。《國語》文學研究中，人物研究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纔呈現出來的。仍以萬平為較早。可見，萬平在《國語》人物、記言、敘事等《國語》文學研究方面的引

領作用。

### (一)《國語》人物形象手法的整體揭示

譚家健在〈試論《國語》的文學價值〉中揭出，《國語》人物描寫的集錦叢見式特徵。認為《國語》先後記述了近百個人物，「其中有些已經相當生動，性格頗為鮮明，形象比較突出，為後來以寫人為主的傳記文學提供了寶貴經驗」，具體體現為：(1) 有將某個人言行集中一起，向人物傳記過渡的趨勢；(2) 在矛盾衝突中展示人物性格及其發展，通過對比體現作者愛憎；(3) 通過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態度，顯示一群人的不同思想、個性和社會地位；(4) 圍繞中心人物，刻畫一些次要人物作為陪襯，使之相得益彰。此外，譚家健還認為：「除上述集錦、對比、叢見、映襯等手法外，《國語》還用許多零散的片段，記述一些嘉言善政、奇行異舉、遠見卓識，雖屬一鱗半爪，吉光片羽，從中也可以看出一定的人物描寫。」<sup>17</sup>1985年，萬平在華中師大《研究生學報》第2期發表〈論《國語》的人物形象〉，後又於《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發表〈論《國語》的人物形象塑造〉。檢萬氏〈塑造〉一文，首先揭出《國語》通過衆多人物的活動來顯示一系列歷史事件及其過程，「因人以記事」，指出不同層次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徵，進而總結了《國語》的人物形象刻畫手法：(1) 注重在尖銳激烈的矛盾衝突中寫人，不光寫出人物做什麼，而且寫出了他們怎樣做；(2) 注重在對照中寫人，使不同的人物相互區別、映襯，各自顯示其性格特徵；(3) 初步出現心理描寫和細節描寫，使人物形象更為豐滿傳神。

此外，對《國語》人物描寫進行整體研究者有林徐典。林氏認為

---

<sup>17</sup> 譚家健：〈試論《國語》的文學價值〉，《江淮論壇》第6期（1983年），頁112—119。後易名為〈《國語》的文學成就〉，收入其《先秦散文藝術新探》（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198—210；《先秦散文藝術新探（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2007），頁248—262。

《國語》的人物描寫主要靠對話來實現。此外，以重耳為例，說明《國語》擅長用絡繹描寫的手法，勾畫人物性格的前後變化。另外，以〈吳語〉夫差、〈越語〉勾踐為例，說明《國語》通過兩個人物互有關聯的言行，對比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徵。以趙文子冠為例，揭示《國語》通過一群人物對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展示其思想個性的手法。以晉周適周為例，說明《國語》也用孤立介紹的手法來描寫人物。在人物描寫中，著重細節描寫。<sup>18</sup>

周靜「《國語》研究」認為《國語》在人物塑造上的最大特點就是「以言寫人」，認為「大量的人物語言不僅豐富了故事情節，使情節更加完整、生動、曲折、細膩，還描摹了人物相貌，刻畫了人物心理，展現了人物性格」。認為《國語》往往通過人物評論展現人物性格。而《國語》的人物形象則可以分為君主形象群、臣子形象群和其他形象。朱中山《〈國語〉人物研究》（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對《國語》人物研究進行了回顧，認為「《國語》人物研究集中於探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語言描寫上，研究成果少且零碎」，這種說法是符合《國語》人物研究實際的。朱氏把《國語》人物研究成果分為單個人物研究和人物群體研究兩個方面進行了回溯，並未注意到萬平和林徐典的研究成果。朱氏按照各語出現人物、人物所屬國別等進行了分別歸納，得出〈晉〉、〈楚〉、〈周〉、〈魯〉人數占《國語》總人數的93%。進而對《國語》的人物分為君、臣兩類，把君主分為納諫之君、拒諫之君，把臣分為評判者與預言家、勸諫之臣、踐行之臣，進而進行了特徵與功能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對《國語》思想進行了對應性分析。進而認為：（1）《國語》在人物分布上，時間跨度大，分佈散亂不均；（2）人物形象片面性、單一性突出；（3）

---

<sup>18</sup>（新）林徐典：《〈國語〉的人物、結構與語言》，林徐典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集刊》（三集），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1990年出版發行，同前。

人物思想穩中有變。作者進而以《左傳》〈古今人表〉所載春秋時期人物為參照，對《國語》《左傳》人物進行了數量、比率比較，又以《論語》道德範疇為參照，進而指出《國語》的核心思想或評人標準側重「德」，而《左傳》的標準側重「禮」。該文對《國語》人物描寫的認識和萬平、林徐典迥然有別，倒和李佳「該書並未著力於人物形象的刻畫，故而人物性格較為單一」<sup>19</sup>之說相呼應。總體上看，朱中山的研究方法多用數據，雖為文學專業，而其研究近於史學方法。

## （二）人物形象研究

此外，其他的研究都屬於人物類型或者具體人物研究。如王華〈驪姬：女性擅權者的文學典型〉（《青海師專學報》1990年第3期）、劉麗平〈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一位「聖母」——論《國語》中的公父文伯之母形象〉（《渝西學院學報》第1期，2003年）、董淑朵〈《國語》驪姬「禍水」形象的文化闡釋〉（《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第4期，2007年）、董淑朵〈「紅顏」的異樣人生——《國語》驪姬「禍水」形象的歷史解讀〉（《昌吉學院學報》第4期，2007年）、董淑朵〈「紅顏禍水」的文學藝術表現——以《國語》驪姬為例〉（《長江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7年）、裴登峰〈夫差形象塑造與《國語》的文學價值〉（《中國文化研究》第3期，2011年）等人的研究屬於具體人物形象研究，且以驪姬的研究比較多見。王文才〈論《國語》中的女性形象〉（《漳州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2000年）、彭建華〈論《國語》的智者女性形象〉（《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3期，2004年）屬於人物類型研究，許全亮〈《國語·召公諫厲王弭謗》的形象塑造藝術〉（《現代語文》第12期，2005年）屬於具體篇章人物形象研究，葉會昌〈簡

---

<sup>19</sup> 李佳：〈《國語》文學析論〉，《輔仁國文學報》第35期（2012年10月），頁85—105。又題為〈《國語》的敘事與說理〉，見載於曲景毅、李佳主編《多元視角與文學文化——古典文學論集》（合肥：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頁1—22。

論《國語》中的相人》(《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1期,2005年)則屬於以《國語》人物為對象的預測手段研究,兼具文學與史學特徵。

## 五、近四十年來《國語》篇章結構研究

近四十年來較早對《國語》結構進行關注的,當屬楊公驥。1957年,其《中國文學》第一分冊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分析「晉獻公殺子和重耳走國」故事中,謂該故事是一個結構龐大的敘事詩式的故事,「故事以神話式的傳說開頭」,謂在序幕中,史蘇作為先知和預言者出現。進而分析了史蘇和晉獻公的性格特徵,認為晉獻公「野心大、喜奉承、驕傲專橫、貪色」,「也就埋下了情節發展的伏線」。接著指出《國語》纂者描寫了晉侯家庭內部所出現的矛盾,寫了驪姬的兒子和姦夫,並從優施口中介紹了申生的為人,進而寫了驪姬的第一個計謀,進而描寫了史蘇對三大夫的警告,三大夫的不同態度、人們對申生的建議、驪姬夜半私語以及獻公的態度、申生伐東山、優施弑里克、申生含冤喪命、驪姬讒逐二公子。對該段故事的結構進行比較精細的分析。

此後進行相關探索者為譚家健和張以仁,如譚家健在〈試論《國語》的文學價值〉中指出,《國語》「在敘事技術和情節構思上有不少探索和創造」。張以仁在〈從《國語》與《左傳》本質上的差異試論後人對《國語》的批評〉一文中指出《國語》「有時言辭之首,或書史事以交待其背景,言辭之末,或附史事以為之徵驗,皆無非是增加其說理的效果而已」<sup>20</sup>。後來,萬平〈《國語》敘事芻論〉也指出了這一點,謂:「《國語》大多數篇章在開頭簡略地介紹事件的發端或某些

<sup>20</sup> 張以仁:〈從《國語》與《左傳》本質上的差異試論後人對《國語》的批評〉(上),《漢學研究》第2期(1983年),頁419-453;〈從《國語》與《左傳》本質上的差異試論後人對《國語》的批評〉(下),《漢學研究》第1期(1984年),頁1-22。又收錄於氏著《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105-182。

徵兆，然後是主要人物的論諫或者對話，可算全章正文……結尾一般較簡潔，通暢是指出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結局，多半和預言應驗有關。」<sup>21</sup>此後，新加坡林徐典也對該問題予以關注，他的〈《國語》的人物、結構與語言〉關注了《國語》人物、語言、結構三個方面。林徐典對《國語》結構的研究主要關注其情節結構，揭出《國語》所載人物對話往往穿插在有情節的故事中，不僅長篇故事具有複雜情節，即便短篇故事也首尾呼應，甚至有些情節還運用幽默手法，表現出濃厚風趣。此外，在情節安排上，和譚家健一樣，指出《國語》有時有運用想象虛構和誇張渲染兩種手法。此外，作者還引錄譚家健的看法，即《國語》在篇章結構上，有意將一個人物的言行集中起來，連續記載，具有向人物傳記過渡的趨勢。此外。林徐典還認為《國語》的議論文字和說理文字在篇章結構上，也具有明顯的特點。以卻至佻天之功為例，論證《國語》議論文字講究邏輯、重視結構；以單穆公諫鑄大鍾為例，說明《國語》說理文字不僅說理細密、分析精微，而且脈絡分明、條理清晰。此外，張素卿 1999 年發表的〈《國語》的「語」：形式與內容——從評析〈祭公諫穆王征犬戎〉出發〉指出該篇包括「前後用以張本、徵驗的記事文字」、「中間祭公謀父的一段長諫辭」，「就〈祭公諫穆王征犬戎〉的內容意旨而言，實以此一長段諫辭為主體，這乃是『語』體的特色」，又指出，「就〈祭公諫穆王征犬戎〉而言，這篇『語』不僅簡要記載周穆王征犬戎的事件背景，和出征之後的結果」，而且記載了祭公謀父的諫辭。可見，張素卿從〈祭公諫穆王征犬戎〉一篇已經注意到了三段式結構。<sup>22</sup>

本世紀以來，有幾位學者對《國語》篇章結構給予關注，如程水金、俞志慧、夏德靠、李佳以及上述幾位學者的著作對此皆有揭示。

<sup>21</sup> 萬平：〈《國語》敘事芻論〉，《北方論叢》第 6 期（2000 年），頁 73—79。

<sup>22</sup> 張素卿〈《國語》的「語」：形式與內容——從評析〈祭公諫穆王征犬戎〉出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創刊號（1999），頁 1—22。

程水金指出：「《國語》的文章結構，往往是先敘事由，次就事而議，最後交待事件的後果。而這後果的善惡又與其議論的褒貶相吻合。」<sup>23</sup>俞志慧指出：「記言記事並重的〈晉語〉的結構，有緣起，有對某一問題的討論，還有結果或影響，因而組成了一個三段式的結構模式。」<sup>24</sup>比較早地提出三段式結構模式這一命題。進而以《周語上》十四條綱目為例，得出「嘉言善語的背景或緣起」、「嘉言善語」、「言的結果」三段式是一個固定的結構模式的結論，對於第三段的呈現方式又取決於第二段內容也進行了區別與分析。進而論證了三段式的普遍有效，也包括一些例外。

史繼東分析了《國語》的整體結構特徵和篇章結構特徵，他認為《國語》整體結構特徵有二，即以國別為緯、以時間為經。其《〈國語〉文學研究》書後所附《國語》各章繫年一覽表，可作為佐證。此外，史繼東認為，《國語》在以時間為經的原則下對材料的安排還做了大膽嘗試，體現在：（1）集錦式的材料安排；（2）對比見義，以類相從。其中集錦式安排是從譚家健〈試論《國語》的文學成就〉一文中「在編撰材料時有意識地講某個人的言行集中地編在一起，以更好地表現一個人的思想、品格乃至個性特徵」之言總結而來。史氏對《國語》篇章結構模式探討從萬平〈《國語》敘事芻論〉脫胎，進一步總結《國語》大多數篇章在結構上形成了三段論結構模式，即每一章由言論的背景或緣起、言論主體、言論的結果三部分構成。史繼東認為張以仁的「有時」、「或」不夠精準，沒有注意到《國語》這種結構模式的普遍性。

夏德靠《〈國語〉敘事研究》也提到《國語》文本自身特徵就是

<sup>23</sup> 程水金：《中國早期文化意識的嬗變——先秦散文發展線索探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頁332。

<sup>24</sup> 如俞志慧〈《國語》〈周、魯、鄭、楚、晉語〉的結構模式及相關問題研究〉，《漢學研究》第2期（2005年），頁35—63。復見載於氏著《古「語」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種背景與資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131—153。

在結構上呈現「三段式」，即規諫的起因、經過及結束，並以恭王游于涇上爲例進行了說明，並謂「三段式」結構屬於典型的「語顯事隱」現象。<sup>25</sup>其《〈國語〉研究》認爲「諫辭文獻+附加文本」纔是《國語》文本主要的結構形態，又分爲兩種類型：其一即「三段式」；其二，諫辭之外，還有「君子曰」或某一具體人物對諫辭的評論。<sup>26</sup>

李佳對《國語》結構模式的探討是建立在《國語》與《論語》《左傳》以及《春秋事語》《汲冢瑣語》的比較基礎上的。李氏以《論語》爲參照，認爲《國語》也存在一段式和兩段式結構，一段時就是單純對話，這種用例也存在，如晉文公和郭偃的對話、趙簡子和壯馳茲的對話等，就屬於這一類。李文同時指出，《國語》的一段式無固定中心人物，對話相對完整。二段式就是「背景+言語」，同時指出和《論語》二段式相比，《國語》的敘事內容豐富且言辭繁複。也指出一段式和二段式在《國語》中所占比例不大。在三段式和四段式論述中，李佳首先指出 Howard W.Sargent 在其著作“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KuoYü”中提出《國語》四段式結構模式，即：(1) 統治者想 xx 想做事；(2) 諫者 xx 引用歷史先例對統治者進行諫言；(3) 統治者或接受或拒絕此建議；(4) 結果。因此，李佳認爲《國語》既存在「背景+言語+結果」的三段式結構模式，也存在「背景+言語+小結果+大結果」的四段式結構模式。李佳認爲，和《左傳》相比，《國語》在背景上表現爲時間性的淡化、材料取捨有法、單純敘事，在言語上表現爲：(1) 通過增減言語，突出主要的對話者；(2) 講究說理的方法；(3) 通過整體結構強調「語」的重要性。在三段式的結果上，《國語》：(1) 有意識地強調時間；(2) 在將時間具體化、實化的同時，又使用時間壓縮法，將時間的概念抽象化、虛化。在四段式的結果上，《國語》小結果表達簡短，大結果對小結果進行回應，「顯示出

<sup>25</sup> 夏德靠：《〈國語〉敘事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頁 196—210。

<sup>26</sup> 夏德靠：《〈國語〉研究》，頁 181—197。

編者的價值判斷，並且含蓄地引導了讀者的觀感，從而將歷史上的個別事件，提升到歷史經驗的層面，結構巧妙，用意深遠」。<sup>27</sup>

可見，對《國語》的篇章結構模式的分析有一段式、兩段式、三段式和四段式之別，其中以三段式模式為主。此外，一些情節結構有附加文本，即夏德靠所言的「『君子曰』或某一具體人物對諫辭的評論」。

此外，尚有學者對《國語》分章問題進行研討者，有關注全書之分章者，有關注具體篇章之次序者。如俞志慧〈《國語》分章商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期，2011年）按照其三段式結構規則，通過排比檢核，發現各本在〈周語下〉、〈魯語下〉、〈晉語五〉、〈楚語〉、〈吳語〉、〈越語上〉分章有異者四十處，加上他自己發現的1處，對這41處分章歧異之處的分合進行了逐條研討。而張建軍與張懷通合撰的〈〈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節次辨正〉（《文獻》第2期，2011年）則認為《國語·周語上》的〈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一章的次序有問題，從史實年代、《史記》排序、《逸周書·芮良夫》反映厲王時期問題、今人研究、《國語》古本與今本之別等角度，論證〈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應該是第三節，〈邵公諫厲王弭謗〉應該是第四節。該文觀點對於認識《國語》具體篇章的次序具有參考價值。

## 六、近四十年來《國語》具體篇章文學研究

具體篇章的研討，主要來自這幾個方面：1.各種古文選一直選錄的具有情感或道德教育價值的篇章。這類篇章的分析往往達到教育或

---

<sup>27</sup> 李佳：〈試論《國語》的篇章結構〉，提交「2009年兩岸四地『《春秋》三傳與經學文化』學術研討會」，見載於方銘主編：《〈春秋〉三傳與經學文化》（長春：長春出版社，2010），頁513-526。其文章的三段式和四段式部分又題為〈試論《國語》的篇章結構及其筆法特徵——以《左傳》互見記載為參照〉，見載於《北京大學學報》第6期（2010年），頁71-78。全文復見其《〈國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149-174。

教化目的，故而對其篇章進行賞析式解讀或結構、或語言的分析；2. 具有特殊史學價值或思想價值的篇章，這類篇章相對小眾，但因為其特殊的價值，為部分學者所重視，進而引起部分學者的研究興趣。往往從史學、思想或者語文教學等角度進行研究。

以〈叔向賀貧〉為例，該篇選入《古文觀止》、《古文釋義》等多種傳統古文讀本，也被眾多文學史或文學作品選選入，有些中學教材、文學或文言讀本也予以選入。故中學教學方面研究者頗多，依照發表年代路列如下：

論文題目	論文作者	期刊名稱	發表年	期號	起始頁碼
〈叔向賀貧〉評註	畢指萱	語文教研	1984	1	33—34
叔向賀貧	張祖夔	教學月刊（中學文科版）	1984	1	28—31
談談〈叔向賀貧〉	蘇維光	中學教育資料（語文教學版）	1984	1	19—21
〈叔向賀貧〉試析	成桂春	中學語文教學	1984	1	31—32
〈叔向賀貧〉的對比藝術	楊海中等	語文教學	1984	1	33—34
史家筆下的正直諷諫——〈叔向賀貧〉簡析	李軍	寧波師專學報	1984	1	62—64
初中語文第六冊		中學語文（開	1984	1	1

教材研究：〈叔向賀貧〉		封)			
舉事徵義 借賀為戒——〈叔向賀貧〉簡析	鈕衛國	語文教學與研究	1984	1	13—15
叔向賀貧	林煒彤	語文新輔	1984	2	132 — 135
〈叔向賀貧〉試析	沈乃薇	教學月刊	1984	2	25—26
〈叔向賀貧〉評析	謝蓬	語文教學	1984	2	22—24
叔向賀貧 《國語》評注	仇仲謙	河池師專學報	1984	2	54
〈叔向賀貧〉備課指要	禮出	語文教學通訊	1984	2	15—18
立論精奇 剖析入理——〈叔向賀貧〉的藝術特色	張漢清等	曲靖師專學報	1984	2	41—42
〈叔向賀貧〉講析	夏業昌	青海教育	1984	3	14—16
〈叔向賀貧〉的議論藝術	殷懷仁	語文教學之友	1984	3	16—17
〈叔向賀貧〉評點及翻譯	金振楷等	語文學習	1984	3	24—25
君子憂道不憂貧	鄧日等	中學語文教學	1984	3	21—23

—〈叔向賀貧〉 中心思想淺析					
〈叔向賀貧〉的 結構技巧	李昌前	中學語文教學 參考	1984	4	38—40
〈叔向賀貧〉的 說理藝術	王懋明	安徽教育	1984	4	35
正反對照 警醒 動人—〈叔向賀 貧〉淺析	楊君展	中學語文教學 參考	1984	4	37—38
〈叔向賀貧〉評 注	宋慶堯	中學文科教學	1984	5	10—11
關於〈叔向賀貧〉 的教學	徐紹仲	中學語文	1984	5	16—17
〈叔向賀貧〉難 句試釋	李昌前	語文教學	1984	5	34—35
〈叔向賀貧〉的 論證藝術	張劉祥	語文教學通訊	1984	6	13—14
〈叔向賀貧〉不 宜入選	王三清	語文教研	1984	6	31—32
對〈叔向賀貧〉 注釋中的異議	趙路保	語文教學	1984	6	36—37
〈叔向賀貧〉有 關人物身世簡介	余平	語文戰線	1984	7	20
〈叔向賀貧〉疑 難詞句疏講	王素仙	語文戰線	1984	7	15—16
「叔向賀貧」引	王爾福	婦女之友	1984	10	9

起的聯想					
妙理瑋辭 巧於 記言－讀〈叔向 賀貧〉	王吉明	陝西教育	1984	12	37－39
〈叔向賀貧〉自 學導讀	王吉明	語文教學通訊	1985	1	48－49
〈叔向賀貧〉閱 讀輔導	王吉明	語文教學通訊	1985	1	48－49
〈叔向賀貧〉補 注	程端君	語文教學陣地	1985	2	40－43
〈叔向賀貧〉中 的「順」與「越」	夏業昌	四川師範大學 學報	1985	2	97
〈叔向賀貧〉教 學札記	梁瑞 柳 等	語文教學	1985	3	34－35
〈叔向賀貧〉的 藝術特色	王啟鵬	進修園	1985	4	10－12
〈叔向賀貧〉教 學二題	曹國賓	語文教學與研 究	1985	5	33－34
〈叔向賀貧〉的 邏輯分析	王立	語文教學與研 究	1985	6	27－29
〈叔向賀貧〉注 釋商榷	曾仲揆	教學研究（中 學文科版）	1986	1	37
〈叔向賀貧〉兩 條注釋異議	陳耀等	寧夏教育學院 學報	1986	1	53－55
〈叔向賀貧〉備 課小札	張文榮	中學語文	1986	2	49

〈叔向賀貧〉資料一則	伍先康	中學語文教學	1986	3	37
〈叔向賀貧〉中的「同」字解	孫民立	語文園地	1986	8	57—58
〈叔向賀貧〉邏輯質疑	蔡明等	邏輯與語言學習	1987	1	25—26
〈叔向賀貧〉文體辨	王學東	語文學習與研究	1987	2	14—15
〈叔向賀貧〉疑難此句解析	陳璧耀	中文自修	1988	5	21—22
想起了叔向賀貧	草旭	黨政論壇	1990	1	42
從「叔向賀貧」說起	任全良	鄉鎮論壇	1990	6	30—31
〈叔向賀貧〉一文談話技巧賞析	廖維宇	演講與口才	1990	6	13—14
叔向賀貧與「公僕」鬪闊	尹立	中國監察	1999	2	42—43
重讀〈叔向賀貧〉有感	洪仁忠	黨員之友	2001	18	
「叔向賀貧」之思	胡衛東	東南軍事學術	2003	5	96
叔向賀貧	李波	法制博覽	2006	5x	39
讀〈叔向賀貧〉有感	呂方彬	大唐杏壇	2009	3	
叔向賀貧	饒忠祥	閱讀與鑒賞 (初中)	2010	10	34—35

〈叔向賀貧〉： 官場小說的當代 範本	鄭國友	大慶師範學院 學報	2011	2	67—69
「叔向賀貧」的 警示	張海鷗	中國軍法	2012	1	60—61
叔向爲什麼會 「賀貧」	鄭連根	國學	2012	10	62—63
由「叔向賀貧」 說起	牛振洲	前進	2014	6	60
叔向賀貧與柳宗 元賀災	王延龍	胡海(文學版)	2015	2	
「叔向賀貧」的 潛台詞	蒙少明	新絲路	2015	9	103
甘於守貧與勇於 賀貧—評〈叔向 賀貧〉中的財富 觀	曾雪陽	廣西社會主義 學院學報	2016	1	88—91
「溯」材活用· 叔向賀貧	周穎潔	高中生學習 (作文素材)	2017	C2	95

可見，僅〈叔向賀貧〉一篇，由於選入中國大陸地區的中學語文教材，故其研究數量相對較多。當然，更多研究側重於教學層面，即如何備課，如何分析主題等等。另外一方面，側重教化層面。也有不少題目涉及語言技巧、論述技巧、寫作手法等等。其研究群體以中學教師爲主。除此之外，由於〈邵公諫厲王弭謗〉、〈勾踐滅吳〉也爲衆多的文學或文言選本選入，故對二篇的研究也比較多見。如施紹文

〈〈召公諫厲王弭謗〉簡析〉(《中文自修》第2期,1984年)、王卯根〈「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探釋——兼談召公諫詞的比喻論證〉(《教學與管理》第4期,1988年)、上官冬〈敘事記言兩相宜:讀〈邵公諫厲王弭謗〉〉(《新聞界》第6期,1990年)、朱人天〈語言樸素 道理深閎——讀〈邵公諫厲王弭謗〉〉(《中文自修》第2期,1995年)、許全亮〈《國語·召公諫厲王弭謗》的形象塑造藝術〉(《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第12期,2005年)、符宏毅〈召公進諫失敗原因探微——〈召公諫厲王弭謗〉的另一種解讀〉(《語文天地》第23期,2006年)、張鈞〈喻中明理理中帶喻——〈召公諫厲王弭謗〉寫作藝術〉(《寫作》第3期,2008年)即對《周語上》第三章進行文學方面的鑒賞,還有的把〈召公諫厲王弭謗〉和〈鄭伯克段于鄆〉進行對比分析。分析〈勾踐滅吳〉的有周承珩〈試論〈勾踐滅吳〉的主題思想〉(《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第6期,1981年)、胡俊林〈史識卓越 記言厚精 堪稱典範——《國語·越語·勾踐滅吳》評析〉(《內江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1993年)、畢泗建〈〈勾踐滅吳〉刪節辨〉(《中學語文教學》第6期,2006年)等對其文學以及相關問題進行揭示分析。此外,還有對「驪姬之難」進行分析的,如張立新〈「驪姬之難」的悲劇內涵和文化意味〉(《雲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2009年)。對「驪姬之難」的分析,前文列舉尚多,讀者可參。

此外,還有通過具體篇章分析或探討普遍性問題,或研討具體篇章的次序者。張素卿〈《國語》的「語」:形式與內容——從評析〈祭公諫穆王征犬戎〉出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1期,1999年)認為〈祭公諫穆王征犬戎〉「係全書載錄的第一篇『語』,就時間而言,也是最早的一篇『語』,具有標識性」,經過陳列前人對本篇的分析,最終認定:「《祭公諫穆王征犬戎》這篇『語』,不僅交代了周穆王征犬戎的事件背景、理由和結果,更在祭公的諫辭之中傳達了一個歷史

人物的觀念見識，其造語修辭的情態同時表現了他的聲氣形象。」故進一步認為：「祭公引經據典，稱述先王事跡、先王之制及先王之訓，乃用以充實立論的根據，並同時在條分縷析、回環承應的修辭當中，具體展現出雍容文雅的人物形象。」進而由該篇的學術意義而上升到對《國語》所載諫辭功能的認定以及對《國語》記事、記言的整體認識上，謂：「《國語》以記言為主，這是它的特點，閱讀這部文獻所載錄的『語』首應注意此一特點。經由以上評析，可以略見『語』的價值不局限於記事一端，人物的言辭本身就具有傳達其觀念見識、表現其聲氣形象的意義。如果專從記事的觀點審視這部文獻，擷取其史料成分，據此刪裁取捨，將使『語』的重要內涵隱微不彰。」接著又對祭公謀父的諫辭進行了概括，認為：「祭公的諫辭為全篇『語』的主要部分，是內容意義的核心。『先王』『德』和『民』三者融貫的整體觀念，這不僅是祭公諫辭的立論主意，也是全篇『語』的宗旨。」進而又由本篇研討而上升到對包括《國語》在內的古「語」文類的探討，根據〈楚語上〉對「語」的功能的界定，指出：「『語』的內容主題基本上屬於政治的範疇，所以說是『治國之善語』。這種文獻類型，其內容想必跟『先王』為政治國的言辭或作為有關，『明德』為其重要義涵，而且先王之德政是具體施惠於『民』的。內容泛及先王，載述其施德、惠民的言行。」實際上是對張以仁《國語》性質功能認定的申說和提升，並認為「《國語》就是此種文獻類型的代表」。又對《文章正宗》對所收十二篇《國語》篇目的分類進行了探討，認為真德秀把十二篇歸屬「辭命」和「議論」兩類固然有他的考慮，實際上這十二篇「在形式和內容方面並無顯著的差異」，其「共通的形式結構而言，它們都以某個人物的言辭為主，針對特定主題加以議論，這佔了大半篇幅，成為其內容意義的主體部分，或在答辭之前記其問語以為前引，或在答辭的前後略微交待事件背景、結果，詳記言辭而簡述事

件，主從輕重之別十分明顯」，進而由十二篇的基本結構模式推及到《國語》全書，謂「《國語》的『語』，往往形諸君臣問答，而以答辭為主，此為其基本形式。偶或君臣之間連番問答，答辭部分還是佔主要地位，甚至只簡述事件背景，然後直接記載具教導或諫諍作用的長篇偉論」，故而認為：「『語』的形式結構以問答對話為主，而且著重諫諍、建言之答辭。長篇偉論的答辭之中，敘故事、敘制度是常見的修辭法，修辭正用以輔助說理。」<sup>28</sup>、《國語》中的『語』，不論相與問答的人物其身份如何，往往側重應答一方的言辭，有些『語』甚至沒有問話作為前引，輕重主從可見一斑。」由微觀而得宏觀，對《國語》中的「語」的特徵進行了比較詳盡的探討，頗有值得參考之處。

可見，《國語》具體篇章研究中，由於一大部分是從教學或教化的角度立論，獨立性較強，很大部分已經脫離《國語》本體，而依傍《國語》的研究則往往能夠從微觀層面進而延及《國語》全書的普遍性。

## 七、「春秋筆法」與《國語》研究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至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則謂為「以一字為褒貶」，故周振甫指出「春秋筆法」有兩個含義，一指歷史書的筆法，一指孔子修訂的《春秋》的筆法。並界定為：「所謂春秋筆法，主要是指不由作者出面來對人物或事件表示意見，是通過對人物或事件的敘述來表示褒貶，含有然事實說話的意味。」<sup>28</sup>《國語》記言，也記事，故其中也含有「春秋筆法」之意，學者頗有討論之者。

如黃永堂、葉修成認為：「《國語》一書，其原始資料估計出自多人之手，而由戰國初期一位熟悉列國掌故的人，利用有關諸侯國的舊

<sup>28</sup> 周振甫：〈春秋筆法（上）〉，《傳媒評論》第10期（1961年），頁41—43。

史材料輯集而成。而其嚴謹的體例，整體設計到細節處理，能充分體現作者的史學思想，是一部構思獨特、見解獨到而且是獨立完成的史學著作。而對人事的褒貶、方法上的字斟句酌、語言界定的嚴格，更見史家著書之筆法。」該文從「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五個方面，結合《國語》進行了分析。認為「婉而成章」在《國語》的用法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 語言表達方式的婉轉屈曲；(2) 史官用諱字來記言載事；(3) 措辭委婉。<sup>29</sup>

趙玉敏則認為，《國語》對「春秋筆法」的發展主要寓於材料的取捨、人物語言與敘述語言的互證及史實的詳略安排之中，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1) 以敘事速度存義；(2) 以人物語言與敘述語言的互證存義；(3) 以敘事詳略存義。<sup>30</sup>

徐加萍則主要考察了「春秋筆法」中「懲惡揚善」的社會功能在《國語》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結合《國語》具體篇章進行了分析。<sup>31</sup>其分析理路與黃永堂等接近。此外，于忠元〈《國語》歷史筆法中的「褒貶善惡」〉(《短篇小說》原創版第 20 期，2013 年) 也對「春秋筆法」在《國語》中的體現進行了總結。

## 八、《國語》文體或文類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之外，尚有對《國語》文體或文類的研究。繞恆久「《國語》研究」把周、魯、鄭、楚諸語歸入論說文和語言片段類，

---

<sup>29</sup> 黃永堂、葉修成：〈析「春秋筆法」在《國語》中的具體運用〉，《貴州文史叢刊》第 2 期（2004 年），頁 6—10。葉修成又以此文易名為〈「春秋筆法」與《國語》書寫〉，提交「2009 年兩岸四地『《春秋》三傳與經學文化』學術研討會」，見載於方銘主編：《〈春秋〉三傳與經學文化》（長春：長春出版社，2010），頁 498—504。

<sup>30</sup> 趙玉敏：〈「春秋筆法」與《國語》歷史書寫〉，《黑龍江社會科學》第 2 期（2007 年），頁 89—92。

<sup>31</sup> 徐加萍：〈試論「春秋筆法」在《國語》中的體現〉，《邊疆經濟與文化》第 11 期（2008 年），頁 92—93。

論說文又分爲立論和駁論，把齊、晉、吳、越諸語歸入春秋體，並且把《國語》各篇一一劃入各類之下。張岩把《國語》的文體分爲譏語文體、勸諫文體、贊語文體和問答文體四類，並一一對號入座，探討其特徵，分析其比例，考辨其成因。<sup>32</sup>俞志慧《古「語」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種背景與資源》，對「語」的體用特徵、存在形式、文類特徵進行了比較周密的研究。張鶴《〈國語〉研究》一書闢有專章〈《國語》文體研究〉，先引述各家之說對「語」體進行了界定，並對語體進行了溯源考證，謂《國語》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體例最完善、編纂精審，是先秦「語」之集大成者。夏德靠精研「語」類文獻，對其形態、演化有專門論斷，裴登峰、史繼東等《國語》論述中也可見對於《國語》「語」體之辨析。

## 九、結語

邵毅平謂：「現代關於《左傳》和《國語》文學成就的評論，除了重視其散文技巧外，還相當重視其敘述故事、刻畫人物、表現性格、展開戲劇性衝突與場景等方面的成就，並將中國敘事文學的真正源頭追溯到它們（而不是因名廢實地追溯到所謂的『小說家』），重耳比古人更深地發掘了它們的文學價值，使它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遂不亞於它們在中國史學史上地位。」<sup>33</sup>相對而言，《國語》文學研究是近四十年來研究較爲充分的一個領域，尤其對《國語》文學性及文學價值、記言、敘事、人物、藝術手法等等的研究越來越細密化。當然，也存在另一問題，即重複研究比較嚴重，尤其體現在中學語文教學的

<sup>32</sup> 張岩：〈春秋戰國文體源流考略——兼談《國語》《左傳》的史料來源和成書情況〉，見載於氏著《從部落文明到禮樂制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401—411。

<sup>33</sup> 邵毅平：〈關於先秦歷史散文的評論的歷史變遷——以《左傳》《國語》《戰國策》爲中心〉，吳兆路等主編《中國學研究》第七輯（濟南：濟南出版社，2005），頁24—34。

具體篇章研究方面，這也是此後研究中，學者在選定《國語》相關選題時需要注意的。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一) 近人論著（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 史繼東：《〈國語〉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 俞志慧：《古「語」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種背景與資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夏德靠：《〈國語〉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
- 夏德靠：《〈國語〉敘事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年。
- 張岩：《從部落文明到禮樂制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 張鶴：《〈國語〉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年。
- 程水金：《中國早期文化意識的嬗變——先秦散文發展線索探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
- 楊公驥：《中國文學》第一分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
- 裴登峰：《〈國語〉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 二、引用論文

#### (一) 期刊論文

- 傅庚生：〈國語選序〉，《人文雜誌》第1期，1957年。
- 周振甫：〈春秋筆法（上）〉，《傳媒評論》第10期，1961年。
- 張以仁：〈從《國語》與《左傳》本質上的差異試論後人對《國語》的批評〉（上），《漢學研究》第2期，1983年。
- 譚家健：〈試論《國語》的文學價值〉，《江淮論壇》第6期，1983年。
- 張以仁：〈從《國語》與《左傳》本質上的差異試論後人對《國語》的批評〉（下），《漢學研究》第1期，1984年。
- 萬平：〈《國語》記言芻論〉，華中師大《研究生學報》第1期，1985

年。

王增文：〈試談《國語》記言的特點〉，《商丘師專學報》第 1 期，1985 年。

萬平：〈論《國語》的人物形象〉，《華中師大研究生學報》第 2 期，1985 年。

萬平：〈論《國語》的敘事——《國語》研究之四〉，《華中師大研究生學報》第 3 期，1985 年。

王華：〈驪姬：女性擅權者的文學典型〉，《青海師專學報》第 3 期，1990 年。

熊憲光：〈國語風格南北異趣〉，《史學史研究》第 3 期，1994 年。

黃永堂：〈簡析《國語》散文創作的獨特成就〉，《貴州社會科學》第 4 期，1996 年。

萬平：〈論《國語》的人物形象塑造〉，《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第 3 期，1998 年。

張素卿：〈《國語》的「語」：形式與內容——從評析〈祭公諫穆王征犬戎〉出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創刊號，1999 年。

萬平：〈《國語》敘事芻論〉，《北方論叢》第 6 期，2000 年。

王文才：〈論《國語》中的女性形象〉，《漳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1 期，2000 年。

唐愛明：〈《國語》說理藝術擷英〉，《重慶三峽學院學報》第 4 期，2002 年。

胡燕：〈《國語》敘事特徵論〉，《涪陵師範學院學報》第 1 期，2003 年。

劉麗平：〈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一位「聖母」——論《國語》中的公父文伯之母形象〉，《渝西學院學報》第 1 期，2003 年。

毛麗：〈試論《國語》的歷史文學成就〉，《漳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2003 年。

- 黃永堂、葉修成：〈析「春秋筆法」在《國語》中的具體運用〉，《貴州文史叢刊》第2期，2004年。
- 彭建華：〈論《國語》的智者女性形象〉，《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3期，2004年。
- 葉會昌：〈簡論《國語》中的相人〉，《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1期，2005年。
- 俞志慧：〈《國語》〈周、魯、鄭、楚、晉語〉的結構模式及相關問題研究〉，《漢學研究》第2期，2005年。
- 許全亮：〈《國語·召公諫厲王弭謗》的形象塑造藝術〉，《現代語文》第12期，2005年。
- 邵毅平：〈關於先秦歷史散文的評論的歷史變遷——以《左傳》《國語》《戰國策》為中心〉，吳兆路等主編：《中國學研究》第七輯，2005年。
- 黃麗麗：〈《國語》的性質與價值——由出土文獻引起的思考〉，《江蘇大學學報》第1期，2006年。
- 汪耀明：〈《國語》記言寫人〉，《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6年。
- 張居三：〈《國語》的編撰意圖及其文學價值〉，《求是學刊》第3期，2007年。
- 趙玉敏：〈「春秋筆法」與《國語》歷史書寫〉，《黑龍江社會科學》第2期，2007年。
- 董淑朵：〈《國語》驪姬「禍水」形象的文化闡釋〉，《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第4期，2007年。
- 董淑朵：〈「紅顏」的異樣人生——《國語》驪姬「禍水」形象的歷史解讀〉，《昌吉學院學報》第4期，2007年。
- 董淑朵：〈「紅顏禍水」的文學藝術表現——以《國語》驪姬為例〉，《長

江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7年。

陳桐生：〈《國語》的性質和文學價值〉，《文學遺產》第4期，2007年。

趙乖勳：〈從《國語》看互見法的萌芽〉，《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2008年。

王寒冬：〈《國語》「記言體」辨〉，《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2期，2008年。

陳鵬程：〈試論《國語》的外交辭令〉，《新餘高專學報》第3期，2008年。

陳鵬程：〈試論《國語》中歌謠諺語的政治功能〉，《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第4期，2008年。

徐加萍：〈試論「春秋筆法」在《國語》中的體現〉，《邊疆經濟與文化》第11期，2008年。

陳鵬程：〈試論《國語》的諫辭藝術〉，《焦作大學學報》第4期，2009年。

李書安、王紅麗：〈從「文」字看《國語·晉語》中的文學意識〉，《電影評介》第21期，2009年。

李書安、王紅麗：〈論《國語·晉語》的語言藝術〉，《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第1期，2010年。

杜鵑：〈論《國語》外交辭令的語言藝術〉，《甘肅社會科學》第2期，2010年。

李書安：〈《國語·晉語》的傳記藝術及其文學價值〉，《求索》第5期，2010年。

李佳：〈試論《國語》的篇章結構及其筆法特徵——以《左傳》互見記載為參照〉，《北京大學學報》第6期，2010年。

張建軍、張懷通：〈〈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節次辨正〉，《文獻》第2期，2011年。

裴登峰：〈夫差形象塑造與《國語》的文學價值〉，《中國文化研究》第3期，2011年。

俞志慧：〈《國語》分章商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期，2011年。

夏繼先：〈《國語》敘事結構分析〉，《湖北大學學報》第5期，2012年。

李佳：〈《國語》文學析論〉，《輔仁國文學報》第35期，2012年10月。

陳鵬程：〈論《國語》的死亡敘事〉，《文藝評論》第10期，2013年。

陳鵬程、葉昕：〈劉向《列女傳》對《國語》女性敘事的承襲和超越〉，《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第2期，2018年。

夏繼先：〈《國語》敘事視角蘊意探蹟〉，《西華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2020年。

## （二）論文集論文

（新）林徐典：〈《國語》的人物、結構與語言〉，林徐典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集刊》（三集），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1990年8月出版發行。

李佳：〈試論《國語》的篇章結構〉，提交「2009年兩岸四地『《春秋》三傳與經學文化』學術研討會」，見載於方銘主編：《〈春秋〉三傳與經學文化》，長春：長春出版社，2010年。

## （三）學位論文

林永堅：《《國語》之文學價值析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

李紀勳：《《國語》의 敘述方式研究》，首爾：成均館大學中語中文科碩士學位請求論文，2001年。

李書安：《《國語·晉語》文學成就研究》，銀川：寧夏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

徐君輝：《《國語·晉語》文學文本研究》，貴陽：貴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黃詠琳：《《國語》敘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師璐露：《《國語》語言藝術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周靜：《《國語》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王晗：《論《國語》的語言》，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姚琳琳：《《國語》對話的文學與思想意義》，哈爾濱：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張帆：《《國語》敘事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朱中山：《《國語》人物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宋瑩瑩：《《國語》議論藝術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黨菲：《《國語》語言和修辭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